



《寻路者》余话

□ 孙郁

青年时代，我徘徊于学问与创作之间。

上世纪80年代，我与许多人一样，如饥似渴地补知识，读过西洋诗学理论，看过古代文章，可就是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一些问题的意识无法在那些表达方式里呈现，辞章逻辑被什么限定了，结果是表达生硬，思维缺乏伸展的空间。

后来到了鲁迅博物馆工作，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慢慢地，我的思想与审美观发生了变化。

博物馆注重对旧物的陈列，还原场景，再现历史。这个过程自然有思想的投射，但因为以史料为主体，精神是敞开的，不同遗物折射的故事不同，告诉我们的是有宽度的空间。这给我很大的触动，隐隐意识到，比起教条的表达，从基本资料出发的思考与书写，意义更大。之前，自己在概念游戏中待得太久了。

我所在的办公楼旁有许多藏书，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新青年》《小说月报》《语丝》《莽原》《新月》等原刊。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作家原稿，从旧的纸张间嗅出前人的气息。接触这些旧刊时，会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缠绕着多样形态，知识人在困境中，各自走了自己的路。他们之间冲突有之，对话亦多，重要的思想闪动，照出存在的多种样式。而我们的文学史与现代史对于彼时社会的描述，大抵遗漏了什么。

偶尔也参与文物搜藏、征集，见到了过去没有接触的旧物。比如，曾与林辰先生接触过，看过他的藏书，被许多版本所吸引，才知道做学问最基本的准备是什么。林先生去世后，我与朋友清理他捐赠的书目，翻看一些未见过的刊物，对于过去的文化行迹自然多了心得。他的文章好，与懂得历史文献有关，古文功底非我们这代人所能企及。曹聚仁先生称赞他的厚重，大概就是指文献的功底。我从他的文字中才知道，学问的文学化表达，要有多方面修养。做到这点，要下许多气力。

研究室有位江小蕙老师，是鲁迅朋友江绍原先生的女儿，她退休后给博物馆捐赠了大量信札。看到



孙郁 郭红松绘

鲁迅、蔡元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墨宝，似乎感受到那些有思想的思想。他们何以丰富现代学术，其间的蛛丝马迹，亦可视为一种注解。

真正触动我的是，在博物馆接触的一批文章家。那时候我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工作，负责编辑业务的老师大概受民国杂志的影响，趣味驳杂，不仅有论文，也设随笔、考据和译文板块，能看到老一代作家楼适夷、黄源、梅志的短文，许多都值得反复咀嚼，还有一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文章，像唐庚的学术随笔、林辰的考据短札、姜德明的书话，都很有意思。在我看来，他们的书写，延续了鲁迅那个时代的遗风，在领悟社会与解析思想时，保持了汉语的温度。

看这些人的文章，震动之余，也反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不会那样表达？后来又认识了汪曾祺、张中行等前辈，才慢慢知道汉语的多种路径。

从材料出发，思考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是博物馆系统和非学院派作家的一种本领，五四遗风有魅力的地方，大概也包括这些。

许多年间，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着我，研究新文化社团的思想，用去了我许多时光。不过，因为基础较薄，阅历有限，对于那代人的理解有着诸多障碍，最初几年一直

不敢下笔，思想与材料尚无法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这本《寻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结果。有一次遇见时任《十月》主编的王占军先生，他请我开一个专栏“寻路者”也许更符合实际，因为他们都是不同路径的开辟者。鲁迅的抵抗之影、陈独秀的孤傲之气、老舍的京味之音，还有巴金的超俗之韵，撕裂了旧的词语之衣，古老的汉语涌出了新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春水的涌动，所至之处，绿色泛波，花香飘动。面对这些遗产，有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写新旧之际的文化人与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将彼时的学术趣味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张中行先生在《负喧琐话》中就是这样处理记忆的，不过他是对亲历岁月的反观，有温度与爱憎。我们追踪那段历史，总还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潜资料里，贴近文本来描述旧影，总还是隔靴搔痒。避免这种局限，就不得不放弃以往的写作方式，调整叙述语态。而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确立自己思维方式的一种跋涉。我们说写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种游戏，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比如写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鲁迅为韦素园写的碑文，也在博物馆的资料室里。看那些同人办的杂志，刊发的多是俄国文学的译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莱夫，文字都有些苦涩，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译者的追求。比如李零野所译《文学与革命》，是鲁迅催促而成的，几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狱。那时的文学活动，并非都

是闲适的产物，他们还是怀揣着梦想的。我们的老馆长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后期人员，他偶尔和人谈起青年时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学，生命呈现着燃烧之状。李先生一生追随鲁迅思想，与时风一直有着距离。馆里的老同志受到的影响很大，以致单位的风气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后新知识分子，有许多是精神的冒险者和引领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时候，重点谈及他精神品位中圣洁的形影，从巴金纪念馆得到的图片与手稿复印件中，可体味到他纯粹的一面。他在鲁迅启示下的寻梦之旅，对于世俗化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种拷问，描述这样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虽然巴金的矛盾与缺陷影响了他的深度，但那种不断与黑暗决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气。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沿着前人铺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传统的士大夫是这样；一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丛莽，或碰见沟壑，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识分子，有许多是这样的状态。现在回望这些寻路者，描述他们，许多时光深处的遗存，只变成了几许片影。满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够的，微观之间，亦有非同寻常之意。细察那些片影下是无数坚毅的足迹，它们述所由来，道其所往，是一条迷人的精神之图。坦率说，写透前辈的形影，并不容易，要读懂他们，也许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的读书记忆

□ 张志松

上小学前我已经认识近百个字了。说来好笑，那时没有识字卡片，我认字靠的是父亲的烟盒。

父亲是个生产队长，爱抽烟，每天一包，抽过丰收牌、勇士牌还有劳动牌等各种烟。父亲每次把抽完的空烟盒随手一扔，我便如获至宝上前捡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积少成多。

刚入学那几天，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我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老师，这个字我认识。”老师有点不相信，直到我念出“动”字时，才笑着点了点头。新书到手后，我迫不及待地翻开语文课本，每翻一页便念一页，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跨过去。

那时候，大队给每个生产队长订了几种报刊，有《致富报》《兴化农民报》《扬州日报》以及杂志什么的。每次从父亲手里接过报纸和杂志，我就逐字逐句地认，不认识的字，就向父亲请教，父亲也乐意教我，并且还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几个月下来，我就尝到了读报刊的甜头，不仅了解了本地发生的新闻以及国内外大事，还认识了更多的字，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已能把整版的报纸全部看懂。

可惜好景不长，做了几年生产队长后，父亲就因身体不适主动让贤，订阅报刊的待遇自然也就旁落别家。

没有课外书，也没有报纸杂志，这对渴望读书的我来说，自然是备受煎熬。虽然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但母亲绝不会拿出一分钱来帮我买书，说家里买盐的钱都没有，还买什么破书呀！没办法，我只好把积压在家里的旧报纸还有杂志又拿出来读。

两年后，我离家到20多里外的镇里上初中。除对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感兴趣外，我对其它课程根本提不起兴趣，语文成绩每次都进入前十名，作文常被当范文读，但数理化的成绩一塌糊涂。

没考上高中，我到姐姐家的花炮厂上班。做花炮又苦又脏又累，我本想干几天就走人，但是有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因为做花炮需要大量纸张，姐夫每月月末就到县上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买来成捆成捆的报纸和杂志，还有大量书籍。我打开其中一捆书，发现有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古典小说《西游记》、台湾琼瑶的小说《聚散两依依》等，我兴奋得握紧拳头，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这下我有书读了。”

我瞒着姐夫把这些书带回宿舍，放在床铺下，担心被姐夫看到，还找来一个纸箱放书，上面用旧衣服盖着。到了下班时间，我哪儿都不去，就待在宿舍，悄悄地把

这些书取出来看，经常看到深夜。随后几天，我又从地放废纸的库里找到了好几本书，有茅盾和鲁迅的杂文集。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在一大摞旧杂志里，我还找到了几本大型文学杂志，如《收获》《十月》《雨花》等，虽然有点破旧，但我还是如获至宝地把这些书藏到了宿舍，否则，这些书难逃被切块做成花炮的命运。

看着成堆的废书堆，我心急如焚，觉得当务之急是把有用的书保存下来，不仅是文学书籍，还有法律、历史、地理、哲学等相关图书。于是，我每天趁着去取废纸的机会，仔细甄别，发现有价值的书籍一律保存，藏到床铺下面。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就有了上百本图书。

有了这些书，我白天做花炮，晚上回来读书，读的书越多，心中的感想就越多，尤其是读到忘我的时候，整个身心沉浸其中，心灵仿佛得到了升华。于是，我开始每天记日记，每周写一篇读后感，但当时并没想到派什么用场。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关读书的征稿启事，便从手头选了一篇读后感寄了过去。没想到几天后就发表了，更没想到，我写的读后感还获得了二等奖！

读书越来越多，我写作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只要下笔，文思泉涌，散文、随笔、小小说等一篇又一篇作品很快散见于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如今的我，多次参加全国征文大赛，还夺得几个大奖。喜欢读书的我，当初压根儿没想到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前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所言极是。

企业图书馆需多方助力

□ 周慧虹

正建成并运营良好的企业内部图书馆还比较少。从当前存在的一些企业内部图书馆来看，大多也面临着图书品种少、新书更替难、资金缺口大、专业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超大型企业，图书很难满足所有员工不同的阅读需求。

越是存在问题，越反映出企业内部图书馆有着巨大的建设与拓展空间。

企业内部图书馆建设，尽管规模大多小于公共图书馆，可它同样离不开热爱阅读、懂得图书馆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同样需要各个出版社、发行机构提供周到的图书馆配服务，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企业应重视企业内部图书馆建设，至为关键的是要配备、选用专门人才；各出版社、发行机构也应及时抓住商机，结合不同企业的特点，探索采取更为精细化的方式满足企业及员工需求，使企业因图书馆而洋溢文化情怀，使社会因企业内部图书馆建设更富书香意韵。



北京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阁时光图书馆。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在历史烟尘中触摸楼兰

□ 夏国强

记载在《史记》《汉书》中的楼兰古城，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上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开启了楼兰研究之门。

当时的考古发掘，多由海外冒险家完成，直至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这里，中方队员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掘得的汉代木简，让寻找楼兰的印记里有了中国人的名字。1980年4月，侯灿率考古队进入楼兰，获取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并在7年后，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把楼兰带回考古研究视域。

阅读《报告》，仿佛跟着考古工作队走进楼兰古城：漫步走过枯朽的胡杨林，房屋周边布满桃核，掺杂着植物的土层墙皮，堆积麦糜的谷仓，不规则的城墙，蜿蜒的古水道以及房屋陶罐中的木牍竹简、官署佛塔、烽燧墓葬。

《报告》用数字为我们搭建巍峨的城墙、劲风吹过的沟坎、成片的房屋建筑，风蚀的佛塔，其间错落的陶壶、木人、布片、铜镜、铁钉、戒指、骨雕，还原着楼兰人的生活场景——他们临水而居，种植果木，耕作商贸，建九层佛塔，画斑斓壁画，更把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模式扩展到其间。412枚木简、164份纸文书，记录了曹魏嘉平四年到前凉建兴十八年，78年间驻守楼兰的官员士卒们日常屯垦筹备、领取器物粮食的信息，还有“浣易衣

裳”的问候和“心书”字样。

器物测量、碳-14测定、文书年号……这些数字无声描述着古老城市的变迁，让我们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能触摸楼兰的记忆：自石器时代起，楼兰就依傍孔雀河的下游聚集人类，两汉形成丝路孔道，魏晋成为西域长史的驻地。

虽然斯文·赫定的《中亚与西藏》(1899-1902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以及随后斯坦因的《沙漠契丹遗址记》《西域考古图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楼兰的发掘记录，但侯灿主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一次，填补了空白，使中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在层叠的历史碎片中，更为系统科学的工作无疑能拼出最贴近真实的楼兰图景。这次考察先从空中和地面探查进入楼兰的道路，1980年3月下旬才分东西两路进入楼兰，除了新疆考古所之外，新疆气象局、新疆地理研究所的加入，使得勘察、清理、图片制作、修复清洗较之以往都更为专业。

《报告》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展现了历次发掘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考古现场，更是一部楼兰考古史。《报告》校订了斯文·赫定、斯坦因标定的楼兰经纬度位置，用更为细致的视角逐次展现了楼兰古城附近的河流、平原、胡杨林以及遗址中的各种植物，使城市地表的人文自然地理要素更为清晰。同时借助气象学的资料，找到了风蚀后的



城墙确址，校正了斯坦因认为城墙呈正方形的错误。而墙址的确定，又使得对夯土层的测定更加细化，发现古城的建造是分筑而成。《报告》对城市建设的关注及前期发掘者未能注意的城市供水问题，补充古水道的数据，沿水道的遗迹调查对斯文·赫定的发掘失误做了很多纠正，验证了斯坦因的一些看法，还在已被斯文·赫定、斯坦因言之凿凿清理完毕的西南区官署中得到了新的文书和文物。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中称，被命名为“孤台墓地”的墓葬群“杂乱无章”和“非常令人费解的混乱”，但《报告》发现该处留存

的MB1墓葬并不是那么无序。在对已发掘的MB2墓葬再次清理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报告》，或许我们就一直迷失在斯坦因的记录中而错失楼兰的风姿。

1987年3月，侯灿完成了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16年9月16日侯先生永远睡去，楼兰还静静地躺在密封好的牛皮口袋中。2019年12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郑重接受了《报告》遗稿，倾注侯灿心血的手写稿和精细的线图、照片，经过整理和校改之后，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完整展现出中国学者的“楼兰”。



·读者之声·

北京有不少企业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呈现出另一种阅读风景——有的企业图书馆集美食、咖啡、阅读、活动等多元元素为一体，使员工在紧张工作之余有了一处安静闲适的阅读空间；有的企业依靠员工在线上建起共享图书馆，支持互相借阅，“线上+线下”让阅读变得生动有趣；更有企业与专业图书机构合作，打造企业云书房，可按员工需求实行“定制阅读”……

这些企业的员工应该说是幸运的，他们可依托图书馆方便地开展阅读，与同事交流读书心得，既充实了自我，又愉悦了心情，进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更充分的知识储备投身于工作。

企业内部图书馆的建设，对于企业自身发展而言，亦大有益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产品技术竞争，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正愈演愈烈。加强内部图书馆建设，是营造良好企业文化氛围、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力抓手。由此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助益，虽不至于立竿见影，然而久久为功，终将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视野，使企业从中尝到甜头，还能有效带动周围其他单位以及员工家属亲近书香，为全民阅读添一把火。

需要看到，与中国各地企业数量之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